

陸印戰略夥伴關係 VS. 美印戰略夥伴關係

一個「美國重返亞洲」因素的觀察與探討

陳亮智

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一般認為，中國大陸與印度之「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發展，是兩個戰略夥伴國家彼此與另一個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問題，亦即中共希望聯合印度以避免印度倒向美國；印度希望聯合中共以避免中共倒向巴基斯坦。這樣一種近似「網綁」(binding)的約束，是用以防範我的戰略夥伴倒向我的戰略競爭者，如此地相互牽制反而能夠促進彼此的安全。因此，陸印戰略夥伴關係是一種融合著「既交往又制衡」(both engagement and balancing)的交友策略。然而，本文觀察到，隨著美國的重返亞洲，以及它對亞太地區的再平衡，華盛頓與新德里雙方業已開始發展出緊密的「美印戰略夥伴關係」。而一般亦普遍地認為，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正是針對中共崛起與「中共威脅論」所做出的具體回應。然而，弔詭地是，當美印關係獲得強化的同時，中共與印度的夥伴關係卻也獲得進一步的強化。此一發展反映出兩個事實：第一、中共很迅速地藉由與印度的交好，如此以回應美國在亞太地區對其所形成的制衡作為；第二、印度很聰明地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取得一個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引入美國勢力以制衡中共的崛起，另一方面也降低陸印雙方對彼此的敵意，避免印度在戰略上受到美國的制約。此一情勢的發展，讓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理論（理想）與實際出現了落差。

關鍵字：戰略夥伴關係、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中共崛起、美國重返亞洲

壹、前言

在「中共崛起」(China's rise)的脈絡之下，一般認為，美國與中共兩大強權已在東亞(西太平洋)地區展開激烈的地緣政治之權力競逐，其所涵蓋的區域主要有東海與南海。然而，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美國與中共兩大強權的地緣政治之權力競逐此刻亦正在南亞(印度洋)區域悄悄地進行，而做為南亞新興崛起的強權—印度，正是美陸兩國競相拉攏的對象。從美陸兩國積極在南亞與印度洋區域的權力角逐看來，華盛頓正急起直追，並且與北京採取相似的策略，也就是透過與印度之「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的建立、深化、與鞏固，進而對北京形成某種程度的制衡作用。而美陸兩國在此區域的戰略競爭端賴誰能與印度形成更為堅強厚實的戰略夥伴關係，誰就能在南亞與印度洋掌握更多的戰略優勢與政經影響力。

事實上，在中共與印度的雙邊關係方面，2003年6月北京與新德里簽署了《「中」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2005年4月雙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06年11月雙方即發表了《聯合宣言》，並且制定深化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10項戰略；2008年1月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於中國大陸進行國是訪問時，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了《「中」印關於21世紀的共同展望》。¹有關陸印兩國這一系列的發展，其正說明了兩國雖有歷史上的交惡與戰爭陰影，邊境與邊界懸而未決的爭議，以及對巴基斯坦所持的態度有所差異等問題，但是北京與新德里的交往與互動，基本上是運作在雙方於2005年所建立起的戰略夥伴關係模式上。

另一方面，在美國與印度的雙邊關係方面，美國於2011年9月就美印戰略夥伴關係表示，一個強大的美印夥伴關係既不會自動形成，也不會自我履行，雖然雙方都有各自的包袱與觀點，但是如同歐巴馬總統所言，美國支持並樂見印度作為一個崛起的強權；一個強大的印度符合美國的利益，正如同一個強大的美國也符合印度的利益。一個強大的美

¹ 〈中國同印度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2/sbgx/>。

印夥伴關係不僅有利於彼此兩個國家，它亦有利於整個世界。² 事實上，歐巴馬總統於 2010 年 11 月上旬訪問新德里時，便期許美印夥伴關係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美國並且表明願意在許多議題上努力協助印度，同時也會積極尋求與其合作，項目包括：貿易與經濟合作、軍事共同防衛與反恐行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席位、民間使用核能協定以及出口管制改革等等。華盛頓表明會努力尋求深化與新德里之間的戰略關係。³

究竟在「美印戰略夥伴關係」形成之後，其對原先所建立的「陸印戰略夥伴關係」會形成什麼影響與衝擊？本文針對「美國重返亞洲」，以及它對亞太地區的「再平衡」(pivot to Asia) 戰略之發生前後的「陸印戰略夥伴」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進行觀察與比較，並評估前者之受到後者的影響與衝擊。本篇論文的发展如下：首先，本文先概略地回顧「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然後闡述兩者對華盛頓、北京、與新德里的戰略意義；其次，作者再從三個理論架構 (theoretical framework) — (1) 結構理論、(2) 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以及 (3) 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來檢視並比較「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基礎；再者，本文觀察與分析「美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因素對「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之戰略利益消長的影響。最後，本文歸結出以下大致的結論：第一、「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原本是希望衝擊並弱化原先所建立的「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然而，事實的發展卻是陸印戰略夥伴

² William J. Burns, "Is There a Future for the U.S.-India Partnershi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s/d/2011/174093.htm>>.

³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May 2010), pp. 43-44; *The U.S.-India Partnership: the Fact Sheets*,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0/11/08/us-india-partnership-fact-sheets>>;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Singh of India*,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0/11/08/joint-statement-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singh-india>>; Vikas Bajaj and Heather Timmons, "Obama to Visit India, and Both Sides Hope to Expand Tie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10; Sheryl Gay Stolberg and Jim Yardley, "Countering China, Obama Backs India for U.N. Council,"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2010; RSIS, "India, US In East Asia: Emerg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Analysis," *BBC Asia Edition*, April 12, 2011.

關係反倒因此而獲得強化，而非弱化。第二、「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原本是希望能削弱中共在南亞與印度洋的影響力，如此以確保中共的崛起為和平的崛起。然而，因為「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強化，北京正在該區域快速地累積其實力與影響力。很顯然地，華盛頓之推動「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期待與其事後的發展是有一段的落差。

貳、「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發展及戰略意義

相較於傳統的軍事同盟關係模式，從冷戰結束之後，「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即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一種「新制度型態」(或「交往模式」)，且為許多大國強權所歡迎並採用，不論是全球性的霸權(美國)或區域性的強權(中共、俄羅斯、與印度)。而美國、中共、與印度三者亦分別建立了兩兩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包括：美陸戰略夥伴關係(The U.S.-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陸印戰略夥伴關係(The Sino-Ind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以及美印戰略夥伴關係(The U.S.-Ind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本節先概略地回顧「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本身的戰略意義與歷史發展，然後闡述兩者分別對華盛頓、北京、與新德里的戰略意義。

一、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發展與戰略意義

(一) 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歷史發展

北京與新德里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深化，事實上是陸印兩個國家彼此與另一個國家之間所存在的「安全威脅」與「權力平衡」問題。進一步來說，北京乃是希望藉由與新德里的聯合，以避免新德里倒向華盛頓(因為北京意識到來自於華盛頓的制衡意圖)；新德里則是希望藉由與北京的聯合以防止北京靠向伊斯蘭馬巴德(因為新德里意識到來自於伊斯蘭馬巴德的敵意與威脅)。因此，北京與新德里的交往模式遂形成一種如同國際關係理論當中所謂之「綑綁」(binding)的策略。也就是說，締結軍事同盟關係或戰略夥伴關係的國家，他們乃是基於期盼約束並防範我的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靠向我的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因此希望藉由雙方「結盟」(alliance)或「聯合」(alignment)

的方式以相互地約束對方，如此以促進彼此的安全。換句話說，陸印戰略夥伴關係是一種混合著「既交往又制衡」(both engagement and balancing)之雙重元素的交友策略。⁴

從歷史發展來看，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開始可以回溯到 2003 年 6 月，當時北京和新德里兩方簽署了《陸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當中，北京與新德里雙方皆認為，兩國的關係已有長足的進展，因此雙方必須發展出和睦友善的鄰居關係，以及一起發展共同的利益。⁵在 2005 年 4 月的時候，陸印兩國政府於《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聯合聲明當中正式宣布，雙方正式建立起兩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⁶緊接著，在 2006 年 11 月到 2008 年 1 月這一段時間，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與當時的印度總理的辛格則分別至對方進行了國是訪問，並發表了《陸印兩國聯合宣言》與《陸印關於 21 世紀之共同的展望》。⁷這一系列的歷史發展正說明了，縱使陸印雙方有過彼此交戰的經驗（1962 年所發生的陸印戰爭），以及雙方在邊界問題上仍存有爭議且懸而未決，但是中共與印度的交往與關係卻是往正面的方向發展。

2013 年 3 月，習近平就任中共國家主席，以及 2014 年 5 月，莫迪 (Narendra Modi) 就任印度總理，其後，陸印戰略夥伴關係則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2014 年 6 月，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訪問了印度，同時也促成了習近平於 2014 年 9 月到印度進行國是訪問。⁸ 在國是訪問當中，習近平表示，做為亞洲最大的兩個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

⁴ Vidya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23-128.

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全文）〉，新華網（2003 年 6 月 2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6/24/content_935350.htm〉。

⁶ 〈中印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國網（2005 年 4 月 12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5/Apr/835473.htm>〉。

⁷ 〈中國和印度發表《聯合宣言》（全文）〉，新華網（2006 年 11 月 2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21/content_5359594.htm〉；「中印簽署二十一世紀的共同展望」，新華網（2008 年 1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15/content_7422185.htm〉。

⁸ 〈中國外長訪問印度：戰略共識遠超分歧〉，BBC 中文網（2014 年 6 月 8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6/140608_wangyi_india〉。

最大的兩個開發中國家，陸印兩國應該和平相處，因為兩國都是「開發中國家」的背景，雙方更應該加強彼此的戰略合作與夥伴關係。而落實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具體作法則包括：建立國家領導人之高層級的定期互訪，加強資訊科技、智慧產業、能源開發等多項產業的交流合作，並且共同進行反恐行動與軍事協同演練等等。有關雙方邊界爭議的問題，習近平認為，雖然此一問題是兩國之間的重大問題，但陸印雙方都願意以和平的方式尋求解決。⁹對此，印度方面亦表示希望與中共尋求更緊密與堅強的合作關係。

印度總理莫迪於 2015 年 5 月則回訪了中國大陸。5 月 14 日，莫迪更造訪了陝西省（即習近平的故鄉）。在此國是訪問當中，習近平表示歡迎，陸印雙方可以就中共近年來所開始倡導與推動的「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等新世紀之總體經濟發展戰略進行相互合作與投資。習近平更強調，北京與新德里雙方應該更加緊地把自己的經濟發展對應與對接到對方的發展策略上去，如此以共同實現陸印兩大經濟體的交流、合作與互補，共同邁向成為亞太經濟發展，乃至是世界經濟成長的「雙引擎」。繼先前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後，為了呼應習近平的倡議，莫迪則提出「東向政策」（Act East Policy），藉此以加強兩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並希望找到彼此國家利益的對應點與對接點。莫迪也表示，印度希望強化與中共的經貿交流，同時也期待參與中共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之總體經濟發展藍圖。莫迪認為，若是如此，則非但可以協助印度發展經濟，同時也可以促進區域與全球的經濟發展。¹⁰就此而言，陸印兩國關係的進展可說是十分地融洽且迅速。

（二）陸印戰略夥伴關係對北京、新德里、與華盛頓的戰略意義

隨著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發展，其對北京、新德里、與華盛

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1193043.shtml〉。

¹⁰ 〈習近平會見印度總理莫迪：中印關係有飛躍的潛力〉，BBC 中文網（2015 年 5 月 14 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5/150514_china_india_modi〉。

頓三方各具有不同的戰略意義。首先，從北京的角度而言，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深化對中共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的戰略意義：第一、中共可利用陸印戰略夥伴關係以突破美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對其所形成的牽制、包圍（或封鎖）。當然，印度也可以利用此戰略夥伴關係以舒緩它與中共之間的敵對關係，從而改變成為促進並且滿足雙方共同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北京也可以藉此避免印度在戰略或戰術上完全地受到美國的主宰；第二、該戰略夥伴關係是北京用以和大國強權進行交往的重要模式（主要是與美國、俄羅斯、與印度），是其「大國外交」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部分，此交往模式是有別於傳統的軍事同盟關係模式。同時，此關係模式亦展現了北京敦親睦鄰之「周邊外交」的發揮，因為戰略夥伴關係多強調「交往」、「合作」與「友善」等重要元素；第三、為了呼應北京之倡議「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經濟發展戰略藍圖，陸印戰略夥伴關係可說是北京實踐此一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環節，因為陸印兩國是亞洲最大的兩個國家，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兩個開發中國家，因此兩個國家的全面性合作會是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之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北京可以藉此將其經濟影響力投射至南亞大陸與印度洋。

其次，從新德里的角度來看，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深化對印度也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的戰略意義：第一、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推動可以讓印度避免在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發展之際，其在戰略與戰術上完全受制於美國的主導與控制。因此，它可為印度帶來某種程度的「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與「戰略彈性」（strategic flexibility）；第二、陸印戰略夥伴關係是新德里用以舒緩它與北京之間互為敵對關係的一個重要交往模式。更進一步地說，此關係架構乃能轉換與提升陸印雙方的交流與合作，並且滿足陸印雙方共同的戰略目標與共同需求，並降低雙方的摩擦與衝突；第三、因應中共所提出之「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總體經濟發展戰略藍圖，陸印戰略夥伴關係對印度而言，是它連結與亞太地區，以及全世界之經濟發展的重要通道，同時也是提供陸印雙方之進行交流合作的重要基礎與架構，並為印度引進中共在其經濟發展上所能提供的各種資源與技術（對中共亦是如此）。

再者，從華盛頓的角度而言，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深化，對美國也具有以下幾項重要的戰略意義，而這些觀點是值得華盛頓方面深思的。第一、若北京運用該關係而成功地達成其敦親睦鄰的「周邊外交」，並且實現中共壯大乃是「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國際印象，那麼美國重返亞洲所欲制衡（或包圍、或封鎖）中共崛起（與中共威脅論）的基礎將嚴重地流失；第二、如前所述，若北京與新德里都藉由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而避免印度在戰略與戰術上完全地受到美國的主導與控制，那麼美國重返亞洲與對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效益將受到嚴重地削弱，至少在印度大陸與印度洋此一區域；第三、若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確實能成功地為中共之總體經濟發展戰略搭建橋樑，並且為陸印兩國創造經濟發展之共同目標，則美國投射在此區域的政治、外交、軍事、與經濟影響力勢必極有可能受到嚴重地壓縮。整體來說，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成功與熱絡，似乎將不利於美國的重返亞洲，及其對亞太地區的再平衡策略。

二、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發展與戰略意義

（一）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歷史發展

相較於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基礎（即戰略夥伴國家彼此與另一個國家之間的「安全威脅」與「權力平衡」問題），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本質則具備了兩個元素。第一、華盛頓與新德里戰略夥伴關係的生成與發展也是兩個國家彼此與另一個國家之間的「安全威脅」與「權力平衡」問題。詳言之，美國乃是希望藉由聯合印度以制衡中共的崛起，尤其是中共在南亞大陸與印度洋越來越大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印度也是希望聯合美國以制衡中共的崛起，因為中共在南亞大陸與印度洋的政經影響力確實越來越大。對美國與印度來說，中共是他們共同的潛在「安全威脅」，美印戰略夥伴關係是美印兩國與中共之間的「權力平衡」問題。準此，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並無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綑綁」策略考量，因為華盛頓較無擔心新德里倒向北京的憂慮，亦不反對新德里與北京發展關係。一樣地，新德里亦無擔心華盛頓倒向北京的憂慮，亦不反對華盛頓與北京發展關係。

第二、華盛頓與新德里的戰略夥伴關係是華盛頓爲了維持美國的優勢地位所採取的一種策略。根據凱伊（Sean Kay）的看法，戰略夥伴關係也可以是大國強權爲了維持其優勢的地位（primacy）而採取「籠絡」或「交好」其他國家的一種交往方式，進而將此些國家置放在它的影響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之下。¹¹準此，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亦可以被視爲是華盛頓爲了在南亞、印度洋地區、乃至全球保持它的顯著卓越（preeminence）與影響力，於是發展與新德里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將新德里置於它的影響範圍之內。總體而言，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是兼具著「權力平衡」與「維持優勢」兩種不同的戰略思考與目標。

有關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發展，我們可以回溯到 2010 年 6 月，當時多位美印雙方的高級官員於華盛頓舉行首次的「美印戰略對話」（U.S.-India Strategic Dialogue）。歐巴馬總統與時任的國務卿柯琳頓（Hillary Clinton）皆強調，印度是美國不可分割，且是重要的夥伴。2010 年 11 月，歐巴馬總統首次訪問了新德里。在該次訪問當中，歐巴馬期許美印夥伴關係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美國願意在許多議題上協助印度，包括：貿易與經濟合作、軍事共同防衛、與反恐行動等，並且努力讓印度成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¹²2012 年 5 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潘尼達（Leon Panetta）訪問印度，尋求和新德里的軍事安全合作。潘尼達並強調，美印軍事合作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當中極爲重要的一部分。

2013 年 7 月，美國副總統拜登亦訪問了印度。在訪問當中，拜登

¹¹ Sean Kay, "What I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Problem of Post-Communism*, Vol. 47, No. 3 (May/June 2000), p. 16.

¹²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0*, pp. 43-44; *The U.S.-India Partnership: the Fat Sheets*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0/11/08/us-india-partnership-fat-sheets>> ;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Singh of India*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0/11/08/joint-statement-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singh-india>> ; Vikas Bajaj and Heather Timmons, "Obama to Visit India, and Both Sides Hope to Expand Tie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10; Sheryl Gay Stolberg and Jim Yardley, "Countering China, Obama Backs India for U. N. Council,"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2010; RSIS, "India, US In East Asia: Emerg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Analysis," *BBC Asia Edition*, April 12, 2011.

與印度方面廣泛地討論了美印雙方所存在的若干爭議性問題，並且努力實現雙方可以合作的可能，這些議題包括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與美印關係，以及對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與敘利亞的態度與立場，拜登同時也希望促進美印雙邊的經貿發展。¹³2013 年 11 月，即將卸任的印度總理辛格訪問了美國，並就安全、貿易、移民改革、與民用核子設施廣泛地交換意見。雖然兩國在 2014 年 3 月經歷了短暫的外交衝突（印度外交官於紐約遭到逮捕，隨後美國駐印度大使包威爾〔Nancy Powell〕去職），很快地，印度新任總理莫迪於 2014 年 9 月便訪問了美國。在訪問當中，美印雙方除了確認多項的貿易投資項目之外，也進一步確認加強雙方的戰略夥伴關係。

2015 年 1 月，歐巴馬總統再次訪問印度，並出席印度共和國的國慶日，歐巴馬並聲稱「美國是印度最好的夥伴」。2015 年 7 月，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與印度國防部長帕里卡爾（Manohar Parrikar）共同簽署了新的為期 10 年的「美印防衛架構協議」（U.S.-India Defense Framework Agreement）。¹⁴2016 年 6 月，印度總理莫迪再次訪問美國，除了與歐巴馬總統會面之外，莫迪更在美國國會向參眾兩院進行演講，並且多次地強調美印兩國的「夥伴關係」。就此而言，與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相較，美印兩國關係的進展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推進，同樣也是十分地融洽且快速。

（二）美印戰略夥伴關係對華盛頓、北京、與新德里的戰略意義

隨著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發展，其對華盛頓、新德里、與北京三方各具有不同的戰略意義。首先，從華盛頓的角度而言，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深化對美國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的意義：第一、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是美國藉由聯合印度以制衡中共的崛起，特別是中共在南亞大陸與印度洋的企圖心與影響力愈發明顯與強烈；第二、美印戰

¹³ 方天賜，〈從美國副總統拜登訪印觀察近期美印關係的發展〉，《安全戰略研析》，第 101 期（2013 年 9 月），頁 39-44。

¹⁴ 以上有關美印兩國關係的進展，請參照：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有關美印兩國關係之大事記（Timeline: U.S.-India Relations）：
<<http://www.cfr.org/india/timeline-us-india-relations/p32994>>。

略夥伴關係可視為是華盛頓為了維繫它在南亞、印度洋、乃至全世界的領導與優勢地位；美國可藉由此一關係模式而將新德里劃歸在它的影響範圍之內。這兩個戰略意義正是呼應了前述美印戰略夥伴關係本質的兩個元素。

其次，從新德里的角度來看，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強化對印度亦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的意義：第一、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是印度藉以聯合美國以制衡中共的崛起，尤其是中共在南亞大陸與印度洋的影響力愈來愈大；第二、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發展也提供新德里一個「東望」與「東向」的機會。藉此，印度可以與美國、日本、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保持連結與合作，避免將所有的籌碼全部都置放在北京一方，以致於為北京所牽制或控制。準此，印度之與美國發展戰略夥伴關係，非但無損於它與中共之間的交往，同時也增加它的戰略選擇空間。

再者，從北京的角度而言，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深化對中共則具有一個極為嚴峻的戰略意義，即北京在南亞大陸與印度洋的戰略利益與政經影響力將受制於該關係的運作，因為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主要關鍵即在於防範中共在此區域影響力量的擴大。因此，如何突破美印戰略合作對其所形成的牽制、封鎖或圍堵，遂成為北京亟待努力的課題。

參、「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之形成基礎的比較

本節以三個理論架構——（1）結構理論、（2）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以及（3）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來檢視並比較「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基礎。而此每一個理論架構則又分別強調以下三個因素：（1）外部威脅（external threat）、（2）相互依賴與全球化（interdependence and globalization）、以及（3）意識型態或政體型態（ideology or regime type）。¹⁵

¹⁵ 有關以「結構理論」、「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以及「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此三個分析架構來對軍事同盟關係或戰略夥伴關係進行探討的初始，請參考陳亮智，〈美『中』戰略夥伴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從『戰略夥伴關係』、『新型大國關係』到『軍事同盟關係』〉，《戰略與評估》，第5卷第1期（2014年春季），頁3-10。

一、結構理論：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是為了應付「共同的外部威脅」

結構理論認為，受到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之結構因素的影響，國家會自動地尋求「結盟」或「聯合」以嚇阻或對抗某一特定之外部威脅（「權力平衡」的觀點）。¹⁶ 因此，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乃是戰略夥伴國家為了尋求共同的國家利益，於是他們互相地聯合。而此時「共同的國家利益」便是共同反制、抵禦來自於外部的威脅。應付「共同之外部威脅」的典型例子即是由北京與莫斯科所締結的「陸俄戰略夥伴關係」（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此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是北京與莫斯科雙方希望制衡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強勢獨霸，同時也希望彼此的聯合能共同對抗北約組織的向東擴張與勢力入侵。¹⁷ 這樣的思維與戰略目標，基本上是符合陸俄兩國的安全考量與國家利益。因此，共同外部威脅的存在可說是戰略夥伴國家之結合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在陸印戰略夥伴關係方面，該戰略夥伴關係的制衡對象與用意顯然與陸俄戰略夥伴關係及印俄戰略夥伴關係所欲進行的權力平衡對象（美國與北約）有極大的不同。陸俄與印俄戰略夥伴關係所欲制衡的對象主要是「北京—莫斯科」與「新德里—莫斯科」兩個組合國家的共同外部威脅：美國與北約。但是，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當中所欲制衡的對象卻是戰略夥伴國家彼此（「北京—新德里」）與另一個國家之間的安全威脅與權力平衡問題。就北京的角度而言，中共是希望藉由與印度交好以避免印度靠向美國；中共不希望印度與美國過於友好，以形成對中共的圍堵與封鎖。就新德里的角度來說，印度是希望聯合中共以避免中共倒向巴基斯坦；印度不希望中共與巴基斯坦太過於友好，以致於對印度造成安全威脅，¹⁸其複雜的程度較前兩者更甚。

¹⁶ Bueno de Mesquita,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eople's Power,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6), p. 532; Stephen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3-43.

¹⁷ 陳亮智，〈美『中』戰略夥伴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從『戰略夥伴關係』、『新型大國關係』到『軍事同盟關係』〉，頁5。

¹⁸ Vidya Nadkarni, *op.cit.*, p. 121; Shen Dingli, "Building China-India Reconciliation," *Asian Perspective*, Vol. 34, No. 4 (Winter 2011), pp. 143-144 and p. 162; Rajesh M. Basrur, "The Rise of China: An Indian Perspective," in Ming Li and Dongmin Lee (eds.),

雖然「北京—新德里」關係的改善與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是基於去除雙方過往的敵對狀態，並且著眼於合作優於衝突的理性選擇，但納德卡妮（Vidya Nadkarni）與沈丁立（Shen Dingli）仍然從權力平衡的角度認為，陸印戰略夥伴雙方的和好是他們都不希望他們的戰略夥伴又與其他的強權交好、以致於對自己形成威脅，因為該強權對我方可能原本就不是很友善，甚或是具有敵意，於是透過戰略夥伴關係以形成一種近似「綑綁」的約束，用以牽制我的夥伴，¹⁹如此地相互牽制反而能夠促進彼此的安全。就此，納德卡妮稱陸印戰略夥伴關係是很典型的「既制衡又交往」（both balancing and engagement）的交友策略。²⁰

相對地，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在「以美國（或與美國）所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當中，其可以被視為是華盛頓之維持美國優越策略的實踐，亦即華盛頓為了在南亞、印度洋地區、以及全世界保持它的領導優勢與影響力。然而，從中共崛起的角度而言，該夥伴關係則可以被理解是華盛頓用以制衡北京的戰略選擇。換言之，在面對中共的崛起以及隨著印度國力增強時，華盛頓與新德里雙方已開始（也必須開始）發展緊密的雙邊關係與戰略合作，其目的就在削弱中共在南亞與印度洋區域的政經影響力，並且力求確保中共的崛起為和平之崛起。²¹就此，美印

China and East Asian Strategic Dynamics: The Shaping of a New Order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1), pp. 120-121.

¹⁹ Randall Schweller 論及，軍事同盟本身的重點不在於能力的集合（capability aggregation），而是對同盟夥伴形成一種行動上的限制或控制（restraint or control），避免該夥伴採取中立，或背叛而倒向我的敵對陣營。準此，我們亦可以推論戰略夥伴關係亦具有類似軍事同盟關係的此一功能或效用。參照：Randall Schweller,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13.

²⁰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pp. 123-128.

²¹ 許多國際關係學者多持此一「權力平衡」的觀點。請參考：陳欣之，〈霸權與崛起強權的互動—美國對中國暨印度的策略〉，《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2卷，第1期，2011年1月，頁21與頁26-30；S. Paul Kapur and Sumit Gangu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India Relation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Rapprochement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Asian Survey*, Vol. 47, No. 4 (July/August 2007), pp. 647-648；J. Mohan Malik,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in Kevin J. Coone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merica and Asia Respon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201-203；Neil Padukone, *Security in a Complex Era: Emerging Challenges Facing India* (New Delhi: Observation Research Foundation, 2010), pp. 41-43；C. Raja Mohan, “Rising India: Partner in Shaping the Global

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則是兼具著「維持優勢」(primacy, 對美國而言)與「權力平衡」(balancing, 對美國與印度而言)兩種不同的戰略思考與目標。

因此,從結構理論與「共同之外部威脅」的角度來看,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北京與新德里之所以結成戰略夥伴關係,並非基於一個共同的外部威脅,而是雙方各自面對不同的外部威脅;是一種較為複雜的,近似「綑綁」的約束,也是「既牽制又交往」的兩面手法。相對地,華盛頓與新德里之所以結成戰略夥伴關係則較為單純,即是雙方是基於應對一個共同的外部威脅——中共。

二、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是雙方互賴與全球化的結果

從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角度而言,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相當程度上是受到戰略夥伴國家彼此之間的「相互依賴」與「全球化程度」的影響。從戰略夥伴關係的定義中所強調之「尋求共同利益」,以及彼此之間因為多重複合的相互依賴關係,還有在全球化脈絡之下所強調之緊密合作與交往等,比起軍事同盟型態的相對嚴謹與嚴格之明文規範,戰略夥伴關係模式反倒是大國強權在進行交流、交往與合作的另一個重要選擇。尤其是,當雙方無法(或一時無法)建立起軍事同盟關係,而彼此在許多方面又必須進行合作以實現共同的國家利益之時。²²也因為如此,許多國際關係的學者與理論家便指出,對抗共同的外部威脅或約束彼此的夥伴國家,並不是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唯一理由或重要理由。相對地,為了促進夥伴國家在各個領域與議題上的合作與問題解決,反倒是戰略夥伴國家們之所以結合在一起的重要理由。²³

Comm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3 (July 2010), pp. 141-142; Richard L. Armitage, R. Nicholas Burns, and Richard Fontaine, *Natural Allies: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of U.S.-India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0), pp. 5-6.

²² 陳亮智,〈美『中』戰略夥伴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從『戰略夥伴關係』、『新型大國關係』到『軍事同盟關係』〉,頁 6-7。

²³ Joseph McMillan, Eugene B. Rum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Engaging Other Major Powers,” in Stephen J. Flanagan and James A. Schear (eds.), *Strategic Challenges: America’s Global Security Agend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基於以上的論點，在陸印戰略夥伴關係方面，納德卡妮認為，經濟相互依賴是吸引陸印兩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一個重要驅動原因，因為雙邊的貿易與投資是相當有助於當今世界兩大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對印度的經濟發展更是如此。與中共的共榮互惠也有助於印度「東望」與「東向」政策的推動，尤其是與東協國家成員國進行交往，因為中共與東協十國亦有非常深厚的經貿往來。²⁴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在科技發展與經濟貿易的合作上，陸印戰略夥伴關係是比陸俄戰略夥伴關係更為加強，其關鍵乃是北京近年來確實意識到印度也是崛起中的區域強權。陸印雙方雖有過往的衝突，以及彼此在安全與權力平衡上具有相互競爭的關係，但是更多問題與議題卻是需要雙方的合作來達成。²⁵

相對地，在美印戰略夥伴關係方面，皮確（Peter Petri）從一個亞洲新興勢力與其整體經濟表現來看，強調美國必須與亞洲國家（尤其是崛起中的經濟強權——中共與印度）發展合作關係，並且進行更快速與更平順的經濟整合。²⁶由於中共與印度皆是亞洲區域當中經濟發展十分迅速的崛起強權，基於貿易與經濟發展的互賴，以及區域整合之趨勢，華盛頓必須與北京、新德里積極地發展包括安全與經濟在內的合作夥伴關係，並且進行相關議題的戰略性對話（strategic dialogue）。²⁷而在與印度的關係上，美印戰略夥伴關係除了有牽制中共崛起的戰略意義之外，雙方經濟上的互賴以及全面性諸多議題的合作，更是華盛頓與新德里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基礎。²⁸

Press, 2008), pp. 149-202;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pp. 44-51.

²⁴ Nadkarni,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Asia: Balancing without Alliances*, p. 124.

²⁵ Yong Deng, "Remolding Great Power Politics: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Russi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d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August-October 2007), pp. 889-891.

²⁶ Peter A. Petri,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2030: Growth, Integration, and Governance," in Ashley J. Tellis, Andrew Marble, and Travis Tanner (eds.), *Asia's Rising Power and America's Continued Purpose* (Seattle, Wash.;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0), pp. 67-72.

²⁷ 陳欣之，〈霸權與崛起強權的互動——美國對中國暨印度的策略〉，頁 11-20。

²⁸ C. Raja Mohan, "Rising India: Partner in Shaping the Global Commons?" pp. 133-148; Richard L. Armitage, R. Nicholas Burns, and Richard Fontaine, *Natural Allies: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of U.S.-India Relations*.

因此，從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論架構與「相互依賴與全球化」的角度來看，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確實有著相當大的相似性。除了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以外，全球化浪潮之下在各個領域與諸多議題上的通力合作，也是形成兩個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關鍵。

三、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是基於彼此共同的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

從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的角度而言，大國強權之進行合縱連橫，乃是他們之間共同分享了相近的信念（belief）、價值（value）、意識型態（ideology）與政治體制（regime type）。由於國家在這些面向的相似性，於是他們發展形成共同的認同（common identities），於是促成彼此之間的結盟與聯合，以對抗共同的外來威脅，並且追求實現共同的利益與價值。²⁹雖然如此，但是仍然有許多的例子說明，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不一致的國家，依然能夠形成戰略夥伴關係，例如美陸戰略夥伴關係、美俄戰略夥伴關係、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俄印戰略夥伴關係等。就此而言，顯見「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的理論架構，在解釋戰略夥伴關係的形成上仍然有相當大的侷限性。

就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而言，中共與印度兩國在信念、認同、價值、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等方面是有明顯的差異，因此與印俄戰略夥伴關係極為相似的是，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的接近與否，並不是構成雙方締結成為戰略夥伴的重要基礎。然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陸俄戰略夥伴關係卻有一個十分接近的地方，即雖然陸印雙方在信念、認同、價值、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等面向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鄧勇（Yong Deng）與沈丁立皆認為，陸印兩國對彼此之做為「崛起強權與大國地位」的認同與追求是相當一致的；雙方皆表明不該忽視對方的經濟成長與國際影響力，並且希望透過結盟與合作的方式，進而達

²⁹ 準此，雖然「意識型態」與「政體型態」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但因為國家在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上的重疊性很高，如自由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多數也是政治民主的國家，因此本文將此兩者共同置放在此一分析視野當中。參照：陳亮智，〈美『中』戰略夥伴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從『戰略夥伴關係』、『新型大國關係』到『軍事同盟關係』〉，頁9。

成共同的戰略利益與目標，也就是讓國際體系成爲一個擁有較多公平性的多極國際體系。³⁰就此而言，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陸俄戰略夥伴關係當中的認同與追求基礎是相近的——北京、新德里及莫斯科三者都是訴諸於追求「大國地位」與成爲「崛起強權」，而這與「意識型態——政治體制」理論架構的原本論點是有所不同的。而另一個不同點是，印度是崛起的區域強權（a rising regional power），俄羅斯卻是衰弱中的區域強權（a declining regional power），而中共則是崛起的區域強權，並且正逐步地邁向成爲全球性的霸權（a global power or hegemony）。

若說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的接近是國家之所以能夠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的關鍵，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便是此一理論的典型代表例子。格林（Michael Green）與端寧（Daniel Twining）便認爲，美國與印度雙方對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的認同與支持，是加強彼此在戰略與經濟上合作的關鍵。以此爲基礎而建立的美印戰略夥伴關係將更加堅強地站在一起，以面對崛起中共所可能帶來的威脅，以及恐怖主義攻擊活動所可能帶來的威脅。美國更加堅信，建立在多元主義（pluralism）之下的民主印度（包括多元種族與多元信仰），確實是美印兩國之締結成爲戰略夥伴國家的基礎，³¹就此而言，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基礎十分類似於美國與它的亞洲同盟國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都是以自由民主的價值信念與政治體制做爲他們成爲戰略夥伴的基礎。³²準此，我們或許也可以推論：若「中共威脅」的因素持續加強，則從「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發展成爲「美印軍事同盟關係」（The U.S.-India alliance）的可能性將大爲增加，因爲雙方除了有共同的外部威脅之外，雙方十分接近的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更是彼此進行聯合與合作的重要基礎。

³⁰ Yong Deng, "Remolding Great Power Politics: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Russi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di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August-October 2007), p. 889; Dingli, "Building China-India Reconciliation," pp. 150-151.

³¹ Michael J. Green, and Daniel Twining, "Democracy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Asia: The Realist Principles Behind an Enduring Ide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1 (April 2008), p. 9; 陳亮智，〈美『中』戰略夥伴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從『戰略夥伴關係』、『新型大國關係』到『軍事同盟關係』〉，頁9。

³² Mohan, "Rising India: Partner in Shaping the Global Commons?" p. 145; Armitage, Burns, and Fontaine, "Natural Allies: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of U.S.-India Relations," pp. 10-11.

從以上「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的分析角度來看，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確實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性。在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當中，北京與新德里雙方在信念、認同、價值、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等方面確實有很大的差異性，但他們依然能夠組成戰略夥伴關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兩國對彼此之做為「崛起強權」與「大國地位」的認同與追求是一致的。相對地，在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當中，華盛頓與新德里兩方在信念、認同、價值、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等方面是有很大的相似性。此一相似點是組成並且深化他們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基礎。有關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比較，請參照附表。

附表：「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比較

	陸印戰略夥伴關係	美印戰略夥伴關係
結構理論： 共同外部威脅	無，但是 中共（聯合印度）的威脅：美國 印度（聯合中共）的威脅：巴基斯坦	有：中共
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互賴與全球化	雙方互依正在強化中 尤其是經濟互依	雙方互賴依存 正在強化中
意識型態與政體體制	不一致，摩擦、衝突不明顯 但追求「崛起強權」與「大國地位」 的理念一致	一致 （自然同盟）
相互威脅	現仍存在若干互為威脅（邊界問題） （中共是美印共同威脅）	曾經互為威脅 現非互為威脅
敵友關係	既是敵人也是朋友 但略偏向敵人	曾經為敵人 現在為朋友
戰略競爭關係	戰略競爭關係（強）	戰略競爭關係（弱）
戰略合作關係	戰略合作關係（強）	戰略合作關係（強）

* 作者製表。

肆、「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美印戰略夥伴關係」、與美國重返亞洲

爲了因應中共的崛起，及北京積極尋求突破第一島鏈的企圖，美國開始推動它的「重返亞洲」與「對亞洲再平衡」的新戰略。美國重返亞洲可回溯到 2009 年 7 月，當時的國務卿柯琳頓在參加東協區域論壇時宣布，美國的力量將重返亞洲。2011 年 10 月，柯琳頓國務卿更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題爲「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對美國之重返亞洲太平洋的決心與政策做一完整的論述。³³隨後，華盛頓即展開一系列提升其與亞太地區同盟國家（包括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與澳洲）之間的軍事合作。同一時間，美國也展開與非同盟國家關係的提升與合作，這些非同盟國家則包括了越南與印度——前者爲美國聯合越南以牽制中共在南海的戰略擴張；後者則是美國聯合印度以防範中共在南亞與印度洋的勢力擴大。

事實上，在南亞與印度洋上，美國、中共、與印度各自兩兩發展出「美陸戰略夥伴關係」、「陸印戰略夥伴關係」、以及「美印戰略夥伴關係」。從華盛頓的角度而言，面對新興崛起的兩大開發中國家，其當戮力經營、管理它與北京及新德里的關係，雖然華盛頓對陸、印兩國的外交呈現出不對稱的成果，³⁴而美陸關係在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的推動之下，也進入了所謂的「新型大國關係」（*a new model for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powers*）。然而，本文必須說明下列幾點觀察：第一、美國對陸、印兩國的外交之所以呈現出不對稱的成果，且後者要比前者較爲進步與強化，其關鍵乃爲，對美國而言，中共崛起比印度崛起更具有威脅性，此威脅性則阻礙了美陸關係的進展與強化。第二、「新型大國

³³ 關於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宣示與新聞報導，請參照：*Remark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9/146917.htm>>；Hi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 189 (November, 2011), pp. 56-63; Jackie Calmes, “Obama’s Trip Emphasizes Role of Pacific Rim,”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 2011.

³⁴ 陳欣之，〈霸權與崛起強權的互動——美國對中國暨印度的策略〉，頁 20-30。

關係」模式的提出與落實正反映了「中共崛起」的事實。³⁵此互動模式可以是原來既有之美陸戰略夥伴關係的延續，然而差別即在於北京努力在近期的戰略夥伴關係中改善、提升它與華盛頓的對等關係，從而獲得美國更多的尊重與善意。第三、就戰略競爭而言，若華盛頓爲了限縮中共崛起以及它在南亞與印度洋的版圖擴張，則它尋求強化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並且弱化陸印戰略夥伴關係，此邏輯與策略是屬合理。第四、對新德里而言，若它也認爲，中共崛起對南亞與印度洋區域具有威脅性，而美國相對是比較不具有威脅性，則尋求或接受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強化，以及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弱化，此邏輯與策略亦屬合理。然而，上述的論述恰恰與事實的發展相互違背——「陸印戰略夥伴關係」並未因爲「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強化而出現弱化的現象，反而也是出現強化的結果。

在美國與印度的關係上，相較於冷戰時期以及後冷戰時期初期兩國的關係低盪，近年來的華盛頓與新德里的關係已呈現長足的進步。在美國方面，當其改變對印度核子計畫的反對立場，疏離並批判巴基斯坦的支持恐怖主義行動之後，美國已轉向與印度建立起經貿、戰略、軍事、與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夥伴關係。在印度方面，雖然其仍持續推動所謂「戰略自主」的外交政策，但尋求與美國和歐盟的發展則是印度另一個重要的外交政策。其中，美印兩國有一極大之地緣政治的共同戰略目標——即聯合彼此以對抗崛起並且充滿自信的中共（a rising and assertive China）。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從 2010 年 6 月以來，美國與印度的關係已有長足的進步，雙方的戰略夥伴關係亦呈現加強合作的趨勢。在此過程當中，我們的確可以看到美印戰略夥伴關係在共同的外部威脅（中共崛

³⁵ 隨著中共國力的迅速攀升，華盛頓與北京的實力差距正快速地縮短當中，於是崛起中的中國大陸將對美國提出一種雙方「更為對等的關係」。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即點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而國家主席習近平亦說出「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陸美兩個大國」。因此，「新型大國關係」的論點即在於反駁、牽制華盛頓之「重返亞洲」和「對亞洲採取再平衡」的論述與做為。換言之，北京希望透過建立與華盛頓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國關係，化解美國因對中共崛起的疑慮而在西太平洋地區所採取一系列的制衡安排與戰略部署。

起、恐怖主義威脅、與大規模毀面性武器擴散等)，在經濟與全球化的相互依賴，以及在意識型態與政治體制等三方面的「相似性」、「共通性」與「相互依賴性」，因而雙方大步向前與深化加強彼此的合作。然而弔詭的是，華盛頓與新德里卻都未曾表示，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之所以強化的原因正是爲了因應他們另一個真正的外部威脅：迅速崛起的北京。換言之，在面對「共同外部威脅」當中，美印兩國並未明言「中共崛起」所帶來的可能潛在威脅。但許多的國際關係的研究者與觀察家，以及相關的新聞媒體分析皆紛紛指出，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強化，不論是對美國或是對印度而言，其共同的目標仍然是爲了制衡正在崛起中的中共。若此，則美國應當希望見到陸印戰略夥伴關係走向弱化；印度應當希望對中共保持適當的距離，甚至是採取疏離的策略。

然而，一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從中共與印度近年來的進步關係看來，很弔詭地是，當我們預期在美國重返亞洲與對亞洲進行再平衡戰略之後，隨著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強化，則早先所建立的陸印戰略夥伴關係應當受到衝擊影響而走向被削弱的命運，因爲華盛頓與新德里有一個共同潛在的外部威脅——北京（雖然美印兩國並未公開明言提及此事）。但是，事實的發展卻與上述的邏輯推論相反，陸印戰略夥伴關係並未出現弱化，甚至是崩離，反而是走向更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這正好反映出以下兩點現象：第一、中共很迅速地對美國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策略之可能形成對它的制衡、包圍、與封鎖做出反應。北京選擇在南亞與印度洋區域與印度交好，如此以避免腹背受敵。而這也是北京「睦鄰政策」的實踐；第二、印度也很聰明地對美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策略做出反應。新德里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取得一個極爲微妙的平衡——即一方面與美國交好，藉引入美國的勢力以制衡中共崛起之所可能形成的威脅；另一方面也與中共交好，藉以適度地降低陸印雙方對彼此的敵意，進而提升共同的相互依賴，同時也避免一味地倒向美國，而在戰略上處處受到華盛頓的制約。準此，在「中共崛起」與「美國重返亞洲」之際，新德里的外交政策與戰略不可謂不明智之舉。

伍、結論

在中共崛起及美國重返亞洲與對亞太地區進行再平衡的脈絡裡，華盛頓與北京兩大強權已悄然地在南亞大陸與印度洋上進行它們之間有關地緣政治的權力競逐。而南亞的新興崛起強權印度，正是美陸兩國所競相拉攏，所欲進行合作的對象。隨著華盛頓與新德里雙方所發展而出的「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一般認為，早先所建立的「陸印戰略夥伴關係」將因此被削弱，因為美印兩國有一極大之地緣政治的共同戰略目標與威脅——中共。

然而弔詭地是，從我們對兩個戰略夥伴關係的回顧與分析之際，本文發現，當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獲得強化的同時，陸印戰略夥伴關係卻也獲得進一步的強化，而不是弱化。對此，本文歸結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美印戰略夥伴關係」與「陸印戰略夥伴關係」兩者之間並不必然存在著相互排斥的關係。換言之，「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強化不必然等於是「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弱化與消逝。相反地，兩者可能皆處於強化與鞏固的狀態。

第二、「美印戰略夥伴關係」與「陸印戰略夥伴關係」沒有呈現相互排斥的關鍵是新德里的態度與立場。換言之，由於印度希望與美國及中共兩者都交好，而美國及中共兩方也都需要印度的合作，因此兩個戰略夥伴關係遂皆呈現強化的狀況。

第三、對中共而言，北京很迅速地藉由與新德里的交好，而對華盛頓之重返亞洲與對亞洲的再平衡所可能形成對它的包圍與封鎖（新圍堵政策）做出具體的反應。

第四、對印度而言，新德里很聰明地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取得一個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將美國的勢力引入，以制衡中共崛起所可能帶來的安全威脅。另一方面也適度地降低陸印雙方對彼此的敵意，透過與中共的合作關係，避免在戰略上受到美國的制約。

如此的發展，對美國而言，確實讓原先的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之戰略

意義出現了理論與實際的差距。而該差距有二：第一、「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強化並未造成「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弱化，反而是促其強化。此一差距的出現恐怕是非華盛頓原先所預見的，當然也非是華盛頓所樂見的；第二、「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強化原希冀能削弱中共在南亞與印度洋區域的影響力。然而，因為「陸印戰略夥伴關係」的強化，北京正在該區域快速地累積其實力與影響力。此一落差恐怕也是超出華盛頓原先的預期。準此，美國可能必須更加審慎地處理它與中共、印度之間的三角關係；最後，對台灣而言，有無可能像印度一樣，可以悠游於美國與中共兩大強權之間？新德里的外交政策與戰略選擇值得臺北做為借鏡與參考。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部政策立場）

The Sino-Ind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VS. The U.S.-Ind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Perspective of “U.S. Return to Asia”

Liang-Chih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TransWorld University

Abstract

In general, the Sino-Ind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Beijing and New Delhi is viewed as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se two powers and another state. In other words, China seeks its alignment with India to avoid New Delhi's move toward Washington; India strengthens it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o prevent Beijing's shift to Islamabad. Their strategies are considered as a “binding” policy restricting each other of partners. Based on this policy, strategic partners will be able to promote their common security by check-and-balance against each other. Therefore, the Sino-Ind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s both engagement and balancing in their relationship.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as the United States is returning to Asia-Pacific, Washington and New Delhi are also working on their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f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U.S.-Ind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s to against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nd its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area. Paradoxically, while the U.S.-Ind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s strengthened at this moment, the Sino-Ind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is also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ituation implies two points as follows: First, Beijing reacts to Washington's return to Asia very quickly by making a friend with New Delhi. Second, New Delhi sails very carefully and smartly between two great powers, Washington and Beijing. On the one hand, it tries to use Washington's force to counter Beijing's influence in South Asia. On the

other hand, it seeks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Beijing to avoid its overdependence on Washington. Indeed, there is a distanc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U.S.-Indian strategic relationship.

Keywords: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Sino-Ind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U.S.-Indian strategic relationship, China's rise, U.S. returns to Asia*